

# 貌“清”、品“清”、詩“清”——論孟浩然

梁 惠 敏

—

自古至今眾多論孟浩然其人其詩者，大抵以“清”稱之。“清”本以形容水之澄澈狀貌，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云：“清，朗也，澄水之貌。”由此又產生了與“清”相搭配以形容各種自然現象的眾多辭彙，後來人們將其引申到對社會現象與人的形象、品格、文藝審美特徵的品評，賦予了這一概念獨特而豐富的內涵，而“清”在孟浩然其人其詩中體現得特別突出，故而稱之。

最早從容貌的角度評孟浩然形象之“清”的是王士源。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云：“孟浩然，字浩然，襄陽人也。骨貌淑清，風神散朗。”王士源與孟浩然是同鄉，自然因鄉情難抑而盛讚其“骨貌淑清，風神散朗”，更在於王士源本人也是高思清遠、喜好自然山水之人，據韋滔《孟浩然集·重序》云：“宣城王士源藻思清遠，深鑒文理，常遊山水，不在人間，著《亢倉子》數篇傳之於代”，從而引孟浩然為同調。據說當年張洎親眼見過王維為孟浩然所畫之像，並親筆題識：“雖軸塵縑古，尚可窺覽。觀右丞筆跡，窮極神妙。襄陽之狀頎而長，峭而瘦，衣白袍，靴帽重戴，乘款段馬——一童總角，提書笈負琴而從——風儀落落，凜然如生。”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）聞一多先生以此認為，“頎而長，峭而瘦”，符合孟浩然的詩人形象，就連他的白袍靴帽也是孟浩然作為詩人的必然扮相，而“骨貌淑清，風神散朗”，“無不與畫像的精神相合，也無不與浩然的詩境一致。總之，詩如其人，或人就是詩，再沒有比孟浩然更具體的例證了。”<sup>①</sup>

最早從人品的角度評孟浩然性情品格之“清”的是李白。李白《贈孟浩然》云：“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。紅顏棄軒冕，白首臥松雲。醉月頻中聖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李白與孟浩然的友誼傳為唐代詩壇的一段佳話。孟浩然長李白12歲而二人結為忘年之交，不僅詩酒唱和，更視彼此為靈性飄逸的同伴、知音。李白此詩在盛讚孟浩然風流儒雅的同時，更表達出他與孟浩然性情品格上的一致性。其“清芬”大體言其淡薄名利、品格高尚、超塵出俗。後來者如白居易《游襄陽懷孟浩然》說“清風無人繼，日暮空襄陽”，符載《從樊漢南為鹿門孟處士求修墓箋》言孟浩然“納靈含粹，仗儒傑立”，胡震亨《唐音癸簽》言“襄陽氣象清遠，心驚孤寂，故其出語灑落，洗盡凡俗”，也都是出“清芬”角度來讚賞孟浩然之“清風”、“含粹”、“清遠”之高尚人品的。孟浩然也正以其耿介不俗的個性和清亮高尚的情操，為同時和後世的人們所傾慕。

最早從審美的角度評孟浩然詩之“清”的是杜甫。杜甫《解悶十二首》之六云：“複憶襄陽孟浩然，清詩句句盡堪傳。”後來者如胡應麟《詩藪·內編》言“襄陽時得大篇，清空雅淡，逸趣翩翩。然自是孟一家，學之必無精彩”，陸時雍《詩境總論》言孟浩然詩“語氣清亮，誦之有泉流石上，風

來松下之音”，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云：“讀孟公詩，且毋論懷抱，毋論格調，只其清空幽冷，如月中聞磬，石上聽泉，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，一洗而空之，真一快也。”也仍然從孟浩然詩的審美特徵而言其“清”，無論是評孟詩的清空清幽清淡的語言，還是評其清亮清曠的色調與風致，孟浩然詩確實具有一種獨特的清美：或清幽，或清空，或清亮，或清曠，或清淡等等，我們都可以從其詩作中找到例證<sup>26</sup>，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云：“孟浩然……五言詩，天下稱其盡美矣。間游秘省，秋月新霽，諸英華賦詩作會，浩然句曰：‘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’舉坐嗟其清絕，鹹擱筆，不復為繼。”再如《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》有“松月生涼夜，風泉滿清聽”之句，是典型的清幽之詩，施補華《峴傭說詩》評杜甫詩時說：“《奉先寺》詩，‘陰壑生虛籟，月森散清影’，清幽何減孟公‘松月生涼夜，風泉滿清聽’之句？”還有如“竹露閉夜滴、松風清晝聽”（《齒坐呈山南諸隱》）、“荷風送香氣，竹露滴清響”（《夏日南京懷辛大》）、“坐聽閑猿嘯，彌清塵外心”（《武陵泛舟》）、“遲爾長江暮，澄清一洗心”（《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》）、“野曠天低樹，江清月近人”（《宿建德江》）等詩句都是極好的例證。當然，也有人以“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”之類詩句說明他“沖澹中有壯逸之氣”的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引《吟譜》語），曾季狸的《艇齋詩話》說：“老杜的《岳陽樓》詩，浩然亦有。浩然雖不及老杜，然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，亦自雄壯”。清代潘德輿也舉例說：“襄陽詩如‘東旭早光芒，浦禽已驚聒。臥聞魚浦口，橈聲暗相撥，日出氣象分，始知江湖闊’、‘太虛生月暈，舟子知天風。掛席候明發，渺漫平湖中。中流見匡阜，勢壓九江雄。香爐初上日，瀑布噴成虹’，精力渾健，俯視一切，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。”（《養一齋詩話》）也有人因為《新唐書·文藝傳》有關於孟浩然“少好節義，喜振人患難”的記載，而孟浩然又有如《醉後贈馬四》所謂“四海重然諾，吾嘗聞白眉。秦城游俠客，相得半酣時”，以及《送朱大入秦》所謂“遊人五陵去，寶劍值千金。分手脫相贈，平生一片心”之類的詩句，便認為孟浩然有“豪俠性格”<sup>27</sup>，如此評說似乎遵循了魯迅先生評陶淵明的準則，而考慮到了孟浩然的“全人”，但以孟氏的詩人本質而論，無論從形象、人品、詩歌的創作特點上看，還是體現在一個“清”字上。浩然身處盛唐，而盛唐整個社會中瀰漫著濃烈的英雄主義氛圍，說幾句“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”，“中流見匡阜，勢壓九江雄”之類的雄壯之語，甚或是涉及兵刀弓馬、立功邊關之類的雄強之語也是極其自然之事，至於“少好節義，喜振人患難”，可以有各種途徑，並非一定就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的豪俠之舉。就盛唐詩人而言，贈人之詩說幾句讚賞遊俠之士的話，以表達對朋友的一片豪情，本在情理之中，由此而視孟浩然有豪俠性格，恐與“頎而長，峭而瘦”的詩人形象相去甚遠。

孟浩然追求明淨、雅潔、澄清、透亮人生之境與詩歌之境，故人們用“清”形容之，“清”的形象、“清”的人品與“清”的詩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統一。自王士源、李白、杜甫等開其端，後來對孟浩然表示崇拜和敬仰之情者甚多。他們以一“清”字對孟浩然及其作品的整體評價頗為中肯。

## 二

孟浩然詩如其人，人如其詩。聞一多先生曾指出，“說是孟浩然的詩，倒不如說是詩的孟浩然，更為準確”，得到了“詩的孟浩然”便可以忘掉“孟浩然的詩”了<sup>40</sup>。孟浩然以一種極其樂觀、詩意妙覺的態度應物、處事、待己，故其詩“清”而高妙。

詩品體現人品，人品之最高處莫過於持有一顆赤子之心以待人應物。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卷三中強調：“詩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亦云：“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孟浩然坦誠待人，始終持有一顆赤子真心，深得人憐愛，因而擁有眾多的朋友。在孟浩然的朋友圈中，既有眾多的社會名流、詩壇才子，如張說、張九齡、韓朝宗、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王昌齡、裴朮、盧僎、裴摠、鄭倩之、獨孤策、張子容、王迴、崔國輔、閻防、張顥等，皆與浩然為忘形之交，也有一些不知名姓的僧道、隱士、村夫等交情至深的朋友，且不論他與朋友贈別酬答的眾多詩作中見出他對朋友的款款深情，只舉《過故人莊》一首，即可見他與處於社會下層的村居朋友的深情交往：“故人具雞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。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。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。”清人黃生《唐詩摘抄》說：“全詩俱以信口道出，筆尖幾不著點墨，淺之至而深，淡之至而濃，老之至而媚，火候至此，並烹煉之績俱化矣。”如果沒有與朋友交往中那種真誠與坦蕩，就不可能有如此感動人意的清純至極而品位至高的詩作。

孟浩然想做官，也本可以去做官。想做官的證據是他青年時代，一度隱居鹿門山，未嘗不是為了走“終南捷徑”。證之於那篇著名的《臨湖贈張丞相》，認為“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”，渴望這位張丞相能推薦他，但沒有結果<sup>41</sup>。孟浩然本可以去做官的極好機會至少有三次。一次是在秘書省賦詩：“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”，因其“清絕”，令舉座驚歎而紛紛擱筆，在“以詩賦取士”的唐代，這位名動京師的詩人及第入仕應該不成問題，結果因浩然詩人氣太重而沒有找到門徑；第二次是在王維處見到唐玄宗，卻因一句“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”這種因拘謹而過分的自謙，加上唐玄宗的誤讀，而導致機會的再度失去；第三次是因為飲酒失約。王士源《孟浩然詩集序》說，“韓朝宗謂浩然問代詩律，置諸周行，必詠穆如之頌，因入秦，與偕行。先揚於朝，與期，約日引謁。及期，浩然會寮友，文酒講好甚適。或曰，‘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，無乃不可乎？’浩然叱曰：‘僕已飲矣，身行樂耳，遑恤其他！’遂畢飲不赴，由是間罷，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。”這與李白何其相似！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說，“李白鬥酒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”李白自己在《憶舊遊譙郡元參軍》一詩中說：“黃金白璧買歌笑，一醉累月輕王侯。”詩人處於一種沉醉狀態，整個情緒系統得到一種自然釋放而不願受任何抑制與約束，此種狀態在詩人為多，“生不願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”，將韓朝宗這樣的社會名流相約之事都可以置之不顧，將天子呼喚的禦旨都可以不予理睬，更何況其他的社會約束。詩人讓自我的個性自由得到最充分的表現，這就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之處。《新唐書》本傳說“浩然文不為仕，佇興而作，故或遲；行不為師，動以求真，故似誕；遊不為利，期以放性，故常貧。名不系於選部，聚不盈于擔石，雖屢空不

給而自若也。”做詩做文的時候，是為了求“真”，而不因為求“仕”而受到束縛，不為“利”所牽扯，那怕是經常處於貧困的生活之中，仍然保持一種放誕不拘，泰然自若的心態，這也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之處。

深知孟浩然個性的摯友王維曾勸其“杜門不復出，久與世情疏。以此為良策，勸君歸舊廬。醉歌田舍酒，笑讀古人書。好是一生事，無勞獻子虛。”（《送孟六歸襄陽》）他確實如閻一多先生所說的“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，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”，而不願意違心而為，有人不解孟浩然的這種心意，認為他晚年想“擺脫經濟困窘，便入了張九齡幕府”<sup>61</sup>，這實在是誤解了詩人，他有《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》詩云：“從禽非吾樂，不好雲夢畋。歲暮登城望，偏令鄉思懸……何意狂歌客，從公亦在旃。”“從公”典出《詩經·秦風·駟鐵》：“公之媚子，從公於狩。”鄭玄箋曰：“媚於上下，謂使君臣合和也。此人從公往狩，言襄公親賢也。”此詩表明浩然並非樂於居九齡幕府而隨從他畋獵，而是感懷九齡好賢重義的深情厚誼，遂云“何意狂歌客，從公亦在旃”，既講明瞭自己是“狂歌”之人，又隱約透露出其入九齡幕府的真正緣由。李白以“楚狂”自許，浩然自稱“狂歌”之人，二人的表白，說明他們與荆楚文化中的狂士文化深有關係。楚狂者，清高之士也，肆意直言，張揚個性，也就是孟子所謂“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”（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），這也是他們兩人在個性格上產生共鳴之處。

孟浩然的行為與詩說明，他追尋的是心靈上、精神上的自在、充實與娛悅，這在根本上將歸結為一個人內心的心靈感受和精神狀態，而與是否能做官，與財富、名望、地位無關。孟浩然說：“翰墨緣情制，高深以意裁”（《韓大侯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》）詩緣真情而作，以真情感人，這也應該是孟浩然詩“清”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孟浩然對“清”詩的追求頗具宗教精神，因為宗教的精髓在於修煉到“明心見性”、“中道無為”的境地。這種境地妙觀莊嚴、靜穆、平和、安詳。佛教認為“煩惱即菩提”，禪宗也有“心齋”、“靜悟”、“坐忘”之說，人生在不斷經歷體悟煩惱、超越煩惱的修煉中親證菩提，通過“心齋”、“靜悟”、“坐忘”而漸通玄妙之理，達到無我之境。孟浩然說：“誤入桃源裏，初憐竹徑深。方知仙子宅，未有世人尋。舞鶴過閑砌，飛猿嘯密林。漸通玄妙理，深得坐忘心。”詩人深知，人能否將一切煩惱與不幸轉化為一種詩意的體悟，提升到用詩意的審美的心態去應對一切人生的遭遇和經歷，這正是詩性精神所宣導的核心價值和意義所在。他好遊寺觀，尋幽訪勝，又常與僧道交往，也是他嚮往詩性“清”境的一種體現。雖然孟浩然有時也有心底不平與矛盾的時候，但從他的整个人生歷程來看，始終保持一種積極樂觀、充實而和諧寧靜的心態，這是他的詩明心見性、清空自在的重要原因。

當然，說到孟浩然之“清”，也與他生活的自然環境不無關係。“山水觀形勝，襄陽美會稽”（《登楚望山最高頂》）表明了他對襄陽深深的憐愛，張祜《題孟浩然宅》亦云：“孟簡雖持節，襄陽屬浩然”，認為襄陽是屬於孟浩然的，可見襄陽優美的地理環境對孟浩然是多麼重要。《南齊書·州郡志》說：“襄陽左右，田土肥良，桑梓野澤，處處而有。”據《輿地廣記》記載：“襄陽府……其民尚文，田土肥良，北據漢沔，西接梁蓋，外帶江漢，北接宛許，南包臨沮，獨雄江上，峴山互其角，挾大

江以為池”，不僅有“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；地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鶴相親，松篁交翠”<sup>60</sup>的隆中，更有瀕臨漢江，雲遮霧繞，如仙女忽隱忽現，令人心馳神往的鹿門山，還有風景如畫的峴山與“西行度連山，北出臨漢水。漢水蹙成潭，旋轉山之趾。……月炯轉山曲，山上見洲尾。綠水帶平沙，盤盤如抱珥”（蘇軾《萬山》）的萬山等等，均說明襄陽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自然環境。他的《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》詩說：“峴山江岸曲，郢水郭門前。……亭樓明落照，井邑秀通川。澗竹生幽興，林風入管弦。”《秋登萬山寄張五》詩亦云：“北山白雲裏，隱者自愉悅。相望試登高，心隨飛雁滅。愁因薄暮起，興是清秋發。時見歸村人，平沙渡頭歇。天邊樹若薺，江畔月如舟。何當載酒來，共醉重陽節。”由此不難理解襄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自然環境，對孟浩然之“清”的心性養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自漢魏以降，襄陽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，從而形成了獨特的隱逸文化。襄陽不僅風景優美，水陸交通便利，而且距離洛陽、長安又不算遠，由此引來許多隱士高人，將襄陽作為隱逸的最好去處。據《輿地廣記》記載，東漢末的龐德公曾隱于鹿門山，《襄陽耆舊記》說他隱於峴山。至於諸葛亮曾隱於隆中，那是名聞天下之事。孟浩然青年時代，曾一度隱居鹿門山，除了想走“終南捷徑”的用意外，未嘗不與受龐德公、諸葛亮這些先輩的影響有關。聞一多先生說：“歷史的龐德公給了他啟示，地理的鹿門山給了他方便……實在，鹿門山的家園早已使隱居成為既成的事實，只要念頭一轉，承認自己是龐德公的繼承人，此身儼然是《高士傳》中人物了。總之，襄陽的歷史地理環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於布衣。孟浩然畢竟是襄陽的孟浩然。”<sup>61</sup>他的《齒坐呈山南諸隱》、《萬山潭作》、《尋滕逸人故居》、《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業》、《題鹿門山》、《夜歸鹿門山歌》等詩歌便是隱逸文化影響下的“清”響之作，他反復表白“予意在山水”、“歸賞故園間”的意思，雖與他仕途追求的人生挫折有關，亦與受襄陽的隱逸文化影響有關。

### 三

但孟浩然畢竟與李白、杜甫有著較大的差距。陳師道《後村詩話》載有蘇軾的評價：“浩然之詩，韻高而才短，如造內法酒手，而無材料耳。”嚴羽《滄浪詩話》亦有云：“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，至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。”孟浩然一生的生活經歷非常簡單，也正因此對社會生活深入瞭解不夠，與李白、杜甫相比較而言，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語。當然，孟浩然基本生活在盛唐繁榮上升時期，與經過了安史之亂的李、杜時代有著絕然的不同是其客觀原因，但未嘗不與他的生活經歷簡單有著直接的關係。當開元元年王維已進士及第，孟浩然還在襄陽隱居，之後數年，才開始長江中下游流域的漫遊活動；開元十二年入京求仕未果又轉道蜀地、吳越漫遊；開元十六年冬赴京應舉落第，後回到襄陽，其間除了與張九齡被貶荊州時作了一年多的幕僚外，大部分時間隱居襄陽。孟浩然的人生經歷大體就是或隱居，或漫遊，或求官。由於大部分時間遠離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，他的詩中幾乎沒有關於當時各種重大政治事件、邊塞戰爭之類的思

想內容。從王士源將其所存260多首詩分為遊覽、贈答、旅行、送別、宴樂、懷思七類即可知其基本內容，不外乎漫遊中的歡欣、隱居時的樂趣、交往贈答時的感懷、尋幽訪勝的興致，再就是求官途中遭遇挫折後的不平，只要看他應舉落第後的詩作，如“當路誰相假？知音世所稀”（《留別王侍禦維》），“豈直昏墊苦，亦為權世沉”（《秦中苦雨思歸》），“惜無金張援，十上空歸來”（《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》），“世途皆自媚，流俗寡相知”（《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》），“寄語朝廷當世人，何時重見長安道”（《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》）等等，然後就是自我安慰式地說：“欲徇五門祿，其如七不堪。早朝非晏起，束帶異抽簪”（《京還贈張淮》），思想內容的逼窄，實乃源於生活視野的不夠開闊所致。

就藝術形式而言也比較單調，其創作形式主要是五言詩，而五言詩中其突出成就在五律、五絕。《蠖齋詩話》指出：“襄陽五言律、絕句，清空自在，淡然有餘；衍作五言排律，轉覺易盡，大遜右丞。蓋長篇中需警策語耐看，不得專以氣體取勝也。”當然也有認為他的五古寫得好的，如《四溟詩話》說：“浩然五言古詩近體，清新高妙，不下李杜。但七言長篇，語平氣緩，若曲澗流泉而無風卷江河之勢。”也有當代學者認為“孟浩然的五言排律，在孟集中與五言古詩、五言律詩三足鼎立，各具成就而又各有特點”<sup>9</sup>，如果細列古人評議，大多認為孟浩然五言律為其所擅長。

顧璘《批點唐音·各體敘目》云：“五言律詩貴乎沉雄溫麗，雅正清遠……唐初唯杜審言，創造工致。盛唐老神妙外，唯王維、孟浩然、岑參三家造極。”

許學夷《詩源辨體》云：“浩然五言律興象玲瓏，風神超邁，即元瑞所謂‘大本先立’，乃盛唐最上乘。”

宋育仁《三唐詩品》云：“襄陽……五律含華洗骨，超然遠神，如初月芙蕖，亭亭秀映。《唐書》稱其方駕李、杜，固知名下無虛。”

王溥等《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》云：“孟公五律，筆潔氣逸，為品最高，較之諸生，尤為神足……自是一代家數。”

因此，就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而論，都證明蘇坡之語不虛。後來明代的胡震亨在《唐音癸簽》中從正面肯定地說：“徐獻忠曰：襄陽氣象清遠，心驚孤寂，故其出語灑落，洗脫凡近，讀之渾然省淨，真彩自複內映。雖藻思不及李翰林，秀調不及王右丞，而閑淡疏豁，翛翛自得之趣，亦有獨長。”其實質意思與東坡所雲無異。當然因人的審美差異與偏好的存在，有人偏好孟浩然之清淡沖和之美，也很自然，王士禎選《唐賢三昧集》，偏向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、柳宗元一邊，以司空圖《詩品》“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”的說法為擇詩標準，偏向於沖和淡遠之詩，而不取“掣鯨魚碧海”的李白、杜甫詩，這與明代鍾惺、譚元春的“察其幽情單緒”有類似之處，而何焯批評王士禎《唐賢三昧集》“乃鍾譚之唾餘”，實在是一語中的。

指出孟浩然詩歌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的不足，並非是否定其詩性意義與審美價值之所在，正好相反，孟浩然詩歌之“清”是人們走向時間與空間深處的一把鑰匙，他“文不為仕，佇興而作”，“行不為師，動以求真”，“遊不為利，期以放性”，“雖屢空不給而自若”的詩人品格，捍衛著人的生

存中最可寶貴的詩性精神。人類不能缺少“清”的人品與詩品，不能缺少對心靈上、精神上的自在、充實與娛悅的追求，事實上，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潛藏著詩情、詩意、詩心、詩性。因此，“詩人何為”並非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定，而是一種強烈的內在訴求，不同的時代都有為世俗者趨之若鶩的東西，但這些東西不能成為詩人恒久品質與“清”美詩性彰顯的障礙物。作為一種人格精神與審美品格的存在，孟浩然貌“清”、品“清”、詩“清”，永遠超越於時代之外。

注釋：

- (1)、聞一多《孟浩然》，《聞一多全集》第6冊，第51頁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(2)、參見張祖安《論孟浩然詩歌“清”的審美意蘊》，載《黑龍江社會科學》2003年第1期。
- (3)、喬象鐘、陳鐵民主編《唐代文學史》第300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(4)、聞一多《孟浩然》，《聞一多全集》第6冊，第54頁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(5)、傅璿琮主編《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》“初盛唐卷”第714頁將此詩系於開元二十五年八月，喬象鐘、陳鐵民主編《唐代文學史》第298頁看法亦同，但恐與孟浩然此一時期的心態不吻合，當以王輝斌《孟浩然研究》之說為是，王氏認為：開元五年，29歲的孟浩然游湖湘時，參加了當時任岳州刺史張說主持的岳陽樓“詩酒筆會”，當場寫下了《臨澗湖贈張丞相》（張說此前曾任宰相），張說也確實對此詩讚賞有加，以致于孟浩然“始有聲于江漢間”（陶翰《送孟大人入蜀序》），參見該書第1、131頁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(6)、喬象鐘、陳鐵民主編《唐代文學史》第297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(7)、羅貫中《三國演義》第367頁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(8)、聞一多《孟浩然》，《聞一多全集》第6冊，第52頁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(9)、王輝斌《孟浩然研究》第144頁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。

（梁惠敏：長江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）